

历史与理性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五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与理性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
五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理性/洪涛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5辑)
ISBN 978-7-208-07386-9

I. 历... II. 洪... III. 政治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文集 IV. D0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8495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五辑 ·

历史与理性

洪涛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25 插页 4 字数 348,000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386-9/D·1264

定价 36.00元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五辑 / 2007年

FUD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5/2007

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或首字音序排列）

陈 峰	香港浸会大学
曹沛霖	复旦大学
何包钢	澳洲迪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何高潮	中山大学
国分良成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景跃进	中国人民大学
孙关宏	复旦大学
王邦佐	复旦大学
夏 明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徐湘林	北京大学
郑世平	美国本特里学院 (Bentley College)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明明 陈 云 陈周旺 郭定平 何俊志 洪 涛 林尚立
刘建军 刘春荣 邱柏生 任军锋 桑玉成 朱 方 臧志军

编辑部成员

刘春荣 陈周旺 敬义嘉 潘忠岐

本辑执行主编 洪 涛 责任编辑 赵荔红

编 前 语

洪 涛

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是否同样也是人类理性成长的历史,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能很自信地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18世纪被历史学家们称作“理性主义的时代”,当时人们乐观地相信,随着关于自然、人、社会的知识的稳步增长,人类社会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理性社会。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源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践有效性。倘若有关人自身的、有关社会的知识,也与自然科学知识一样稳定增长,那么,理想社会之实现终究会成为可能。18世纪启蒙哲人对此怀有无限信仰与信心,他们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传人,依然在推进这一事业:使人文与社会知识自然科学化。

18世纪理性主义理想,是建立于人的理性能力的充分有效的前提假设之上的。人被认为是理性人,其理性能力被认为源于其内在意识结构之中。人人均如此,概无例外。任何与理性无关的东西,无论习俗、传统,还是情感、激情,一概被排斥于理性之外。知识之纯度,成为塑造完美人类社会之前提条件。这里头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前言中说:

“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立法凭借其威严,想要逃脱批判。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怀疑,并无法要求获得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把这种敬重给予能够经得起它的自由的和公开的检验的东西。”^①

一切均当受到人的理性的批判,无论神圣之宗教,还是世俗之法律,都绝无例外。人所能倚赖者,唯人自身之理性能力而已。在这样一个理性主义时代的这个纯乎又纯的理性主义,是人类所曾有过的最彻底的思想解放。恩格斯说: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

^①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卷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

然而,“用头立地”终究不能长久。18世纪末的革命告诉人们,人的激情的力量似乎要大于人的理性能力,甚至人的理性的动力,依然与人性自身的激情有关。在理性主义之后的是浪漫主义,它们之间的分水岭就是大革命,前者倾向乐观主义,后者倾向悲观主义,但在两者的血管中流淌着的,都是理想主义。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艺术家纯乎又纯的艺术,已然成为资产者客厅里的摆设;一度对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艺术家们,不知不觉地在为由资产阶级主顾所构成的艺术品市场提供商品。而实证主义,这一启蒙理性主义的嫡生子,也很快沦落为可以为任何主人服务的职业经理人。

18世纪理性主义所带来的,更多的是牟利活动的理性化以及统治活动的理性化,具体化为企业的科层制和行政的科层制。科层制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带来了生产的突飞猛进,但是,与手段的高度理性化并行发展的,是目的的高度非理性化。这一目的与手段的悖离,在20世纪登峰造极,人类已经拥有了将自身完全毁灭的技术手段,但是,对于人应该如何生这一问题,却依然感到迷惘。

自然科学的对象与人的科学的对象有本质的不同,在操纵领域中取得极大实效的知识,并不能解决目的领域中的根本问题。关于人的知识,不可能来自有关人的生理学与有关人的心理学,而只能来自人自身。所谓人自身,并非指人自己的身体。人只能从人的既有历史中来认识人自身,因为人就是他的实践活动,因而,有关人的知识,就是关于历史的知识与有关历史的自我认识的知识。与18世纪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被称作“历史主义的时代”。

理性自有其发展的历程,古典理性不同于现代理性,工具理性不同于价值理性,康德与黑格尔所讲理性不同;梁漱溟以中国为一“理性之国”,他所谓之“理性”与西方之“理性”亦不同。欲穷究其间的差别,必不能离开历史的研究。

有人以为,但凡在此刻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只能由历史学专业的人来研究,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深表赞同的,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这种历史学的研究,要能把现在与过去真正结合起来,使过去有益于现在,使现在离不开过去。但是,如若历史学研究做不到这一点,如若将过去仅仅作为过去来研究,把历史当作一间停尸房,当作死人及其遗物的搜集与收藏,那么,别的学科去从事历史的研究也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注定是要以关于人的知识为其知识的基础。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九,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05页,第1版。

有人以为讲历史便是讲古文献。把历史当作编年史,把历史当作历史资料集,这自然是一种见解,虽然与档案管理人的看法实无太大差别。在我们看来,尽管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出生,还是在公元前552年出生,在停尸房或古墓管理人看来,是重大学术问题,但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我们尽可以交给研究“真相”的历史学家去做,因为倘若把历史当作停尸房,那么除了靠它吃饭的人之外,旁人是没有兴趣进去的。

我们以为,研究历史原本是为了现在的人的生活,是为了回答人从何处来,人之所是为何之类的根本问题,我们以为这才是历史研究所要追问的“真相”,而不是那些零敲碎打的“事实”。因此,只有被理解了的事实,只有在追寻意义的探索中被组织起来的事实,才是历史,才会与当下的人的生活发生真正的关联。因此,无论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还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说明历史并不是简单的事实的罗列,而且即便罗列事实材料,依然必需某些非历史材料的思想秩序。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历史是可以随意编造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或非历史学家的叙事,但就此以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造出来的,也是片面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那些认为历史就是纯粹的材料看法,恰恰是虚无主义的。这种看法将会使历史成为手术台上的残尸。所以,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不少“据他们说”,但他们依然不失为中西两大历史传统的开创者。

本卷的主题:历史与理性,表明了历史与理性之不可分。林国荣先生的《伯里克利和他的帝国》一文,自可使读者体会过去了的事实与普遍的思想意义之间的关联。思想本来是在历史中的,但是,历史也是在思想中被叙述的。李辉先生《伟大心灵之间的对话》对比了古今两大家柏拉图与马基雅维里的两个文本,以彰显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刘晨光先生的论文和余宜斌先生选译的麦克弗森的著述,分别以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为主题,他们的研究将会深化我们对这两位现代政治哲学的先驱的理解。孙磊先生《德性与伦理,还是规范与权利》一文在古今视野中探讨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公共性问题。

专题论文中没有有关中国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讨论,这倒也不是出于“非要去”不研究的缘故。最后,即便有人认为在后现代状况下无法讨论具体的观点——因为据说观点人人都可以发表,我们却并不以为如此,因此,所有的学术批评都将受到热烈欢迎。

目 录

编前语 /洪 涛 1

特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野中的政治文明建设 /桑玉成 王 涛 1

专题:历史与理性

伯里克利与他的帝国 /林国荣 16

伟大心灵之间的对话

——《政治家》与《君主论》互勘 /李 辉 35

君主与国家: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初探 /刘晨光 46

霍布斯的资产者 /C.B.麦克弗森 76

德性与伦理,还是规范与权利?

——阿伦特、哈贝马斯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 /孙 磊 89

研究论文

“不发达”与“欠发达”:历史与结构

——关于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等概念的一个讨论 /陈明明 111

党治与民治: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中的政党论述 /王向民 127

16世纪耶稣会士入华与明代中国行政管理的制度性固弊 /周 天 138

荀子政治思想探微 /齐义虎 164

旧文重刊

古政原论 /刘师培 213

评论

浪漫主义、政治及其他

——兼论郁达夫 /洪 涛 237

书评

古典思想的“现代”诠释

——评尼柯尔斯《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 /李威利 30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野中的政治文明建设

桑玉成 王 涛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①并对之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概括和总结。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最核心、最关键的层次,统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根据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有以下基本内容:1.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3.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4.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5. 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上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灵魂,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奋斗目标,规定了党领导人民群众所要走的道路和方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情感纽带,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特点以及今日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中基本层次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为维系当下社会秩序奠定了伦理道德基础。这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蕴含了有关社会主义的诸种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因失去遵循而迷失方向。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正确方向,才能把握社会主义价值需要、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键。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议题,把政治

^①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文明。今后的一段时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相互间提出的要求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神之基

一般地说,政治文明主要有价值、制度、组织与行为四个层次:(1)价值层次,人们在一定的世界观的引导下,形成好坏、善恶的标准,进而对某些事物或生活状态产生追求。对于人们来说,这些实在的或抽象的事物、生活状态就是价值。人类所追求的政治价值有安全、秩序、民主、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等。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民主等大多数政治价值都成为普世性的价值,为人类所共同追求。(2)制度层次,为了追求、实现和维护政治价值,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自发地形成或设计某种政治制度。由于文化、民族性、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且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3)组织层次,一般地说,政治活动的角色除了个人以外,主要是由组织来承担,如政党、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等。(4)行为层次,在一定的制度框架的规制下,人、组织在政治活动中日渐形成具有相当稳定性的行为模式,这些模式积淀在公民的心理与品质之中,构成该社会的风俗习惯。在这四个层次之中,价值处于核心地位,引导、规范制度、组织和行为;制度以价值为内核,并维护与实现价值;组织和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内展开,受到制度框架的制约。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产生的政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价值、制度、组织与行为四个层面上解释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精神之基,并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实践的根本方向。具体地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意义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基础

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为基础,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的学说。首先,马克思主义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属性,即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

会的过渡阶段,它需要继承和改进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真正实现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

其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而来,因为可以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如:(1)代议制,人民通过将权力委托给“代表”参与政治,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2)选举制度,通过选举,人民得以表达意志,这是最基本的民主制度;(3)政党制度,不同阶层、群体通过组建政党,并通过政党竞争来实现其利益主张;(4)分权制衡原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通过不同的机构分掌国家权力,以避免腐败、专制;(5)政治与行政分离原则,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有不同的特点,需要通过制度分离开,由不同的组织来掌管;(6)司法独立,等等。

再次,不仅马克思主义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中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国情,应该坚持以下制度:(1)共产党的领导;(2)民主集中制;(3)人民代表大会制;(4)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5)民族区域自治;(6)基层群众自治。

总之,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而且它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属性和历史方位,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具体的规划和原则。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其他政治文明的区别,同时,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奋斗目标

尽管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主义是普世的、必然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要达到且经历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但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的国家因历史文化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政治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限制,它们建立社会主义的时间、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以及社会主义因素的体现程度都各不相同,所以每一个国家必须要立足于国情,实事求是地确立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的奋斗目标,它体现了普世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国情、中华民族相结合的具体性、民族性,同时,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对民族文化传统、国民性等因素的考虑,也与政治制度的生产、发展和变革的规律相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不仅规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体现中国特

色,而且还能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这一理想之下。

3.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认同

人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生活,离开了共同体人无法生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能离开城邦生存的,非神即兽。”^①共同体是人的生命得以展开的空间和场所,它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方面,共同体为人提供物质性、社会性的资源,使人得以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共同体为人提供精神性的资源,如身份意识、族群归属感等。由此,人对自身生存的热爱,必定扩展到对作为其生存基础的共同体的热爱。在现代,对共同体的热爱表现为对于民族国家的热爱,这就是爱国主义。

民族国家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概念,它总是由具体的政治机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来代表与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国家的概念与该国的政治文明紧密相联,尽管它不直接等同于后者。在爱国情感中,对抽象的民族国家的热爱一般会以对该国的政治文明的热爱体现出来,即热爱、捍卫、保持、改进和完善该国政治文明。由此,在中国,爱国主义必将增进对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解、认同与支持,构成民族精神的核心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情感基础。

4.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动力

改革开放释放了全国人民的创造活力,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其中,改革创新是核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精神状态。只有在改革创新的状态中,我们才能冲破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破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只有牢牢地把握了时代精神,我们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事业。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致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当下社会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的变革,它需要不断地通过改革创新,以完善自身,因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②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深入使一些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与方式变得不合时宜,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需要逐步调整和改善;另一方面,需要富有远见地变革政治体制,为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社会体制与政策的建立健全提供空间。在当前中国,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核心,它为经济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动力。

5. 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伦理基础

伦理秩序是运用道德准则来约束人的内心、进而在人们之间形成的规范性秩序,它诉诸个人良心、社会舆论,同以暴力为基础的法律秩序、政治秩序一起,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主要由国家伦理来提供,相应的伦理秩序也主要由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单位”等组织体制来维护,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伦理原则,注重个人对国家、集体的服从和奉献。^①

建国后,这些崇高的道德理想与伦理原则激励着人们投身于新国家的建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逐渐从社会领域退出,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个人的社会流动空间逐渐增大,相应地,个人的自主性以及伦理个人抉择意识逐渐增强,由国家权力维持的革命性伦理秩序的基础被削弱,其规范性力量也日益消退。此时,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应运而生,提出了更适合于世俗生活与当下社会现实的道德要求,不仅适应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状况,更是成为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伦理基础。

以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五项内容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间关系的分析,证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精神之基。只有牢牢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实践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保持正确的方向、取得源源不竭的动力。

二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任务。^②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一度停滞,相应的努力遇到了挫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重新将政治发展引入正轨,提出发展民主与法制的任务,明确建设

① 陈明明:《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3期。

② 林尚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人民论坛》,2003年11月。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和内在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为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具体地说,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主要取得了以下几点成就:

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系统观点

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提出了真理性的认识,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关理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观点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将这些基本原则应用到国家创立与建设的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并对发展民主与法治、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论述。其后,党又在十六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观点。

2. 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制度体系

建国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吸取现代政治文明、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我国特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等等,尽管这些制度仍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但可以认为,这些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制度体系。

3. 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层民主在不断扩大

自改革开放、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来,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不断制定、颁布新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在十五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标志着党和国家已经明确了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扩大基层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目前,中国已

^①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见 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_3645697.htm。

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①

4. 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执政党”的历史定位和角色定位

现代政治的特征是政党政治,中国也不例外,尽管具体的形式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革命创建了新中国,而且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然而,任何一个政党想要保持执政地位,就要及时地调整自身的历史定位、目标和政策,以适应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赢得时代的认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大会报告中,党已经提出自身历史定位和角色定位的转换,“我们党已经从一个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②可以认为,“执政党”的定位将会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

5.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政府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中心环节,它对两者的健康运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获得成功的条件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一直致力于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尤其是党的十五大前后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尽管时有反复,但总体来说,政府机构改革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保证了市场体制的确立。之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是,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设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明确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落实《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依法行政,并公开政府公务,接受公众质询监督,此外,还要增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③

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由于经济改革、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的变革等因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而且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还将阻碍社会

①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见 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_3645697.htm。

②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③ 上海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06》,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分析起来,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还不够,在有关制度方面尚待进一步完善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优越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仅赋予人民形式上、制度上的政治权利,而且通过使人民达到经济与社会上的平等,真正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掌握最终的国家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形式。但在现实中,选举制度以及人大的权威还不够,相对于普通选民的代议制度还不完善,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还得不到发挥,所产生的影响力比较弱,政府决策的取向、目标往往被部门利益、利益集团所主导,普通民众的福利被忽视。

近些年来,因拆迁、征地等涉及普通民众切身利益问题引发的大范围的上访、群体性事件,就反映了这一点。其实,民主不仅是一种理想价值追求,在政治现实中,它更是调节利益关系、化解利益冲突并实现稳定有序政治局面的制度机制。有调查表明,凡是一些基层民主落实比较好的地方,上访、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就少。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切实落实民众的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是发展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正如胡锦涛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①

2. 需要继续提高党运作现代国家制度的执政能力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政治原则,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领导路径与国家制度运作的具体机制、具体过程、具体方式紧密相关。由此,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就要首先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始。

在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我们党逐渐地形成了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党直接参与、甚至替代政府管理,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既削弱

^① 摘自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见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zh_cn/faus/hjt4/11016423/20040129/116/1807.htm。

^② 桑玉成:《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了党作为政党组织所具有的沟通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又削弱了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党与政府权限的混淆、党对政府事务的直接干预,既出现了“党不管党”,忽视正常的组织生活与组织建设的现象,又使政府运作方向扭曲,使之成为党组织、党委的附属物。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让党获得相对于政府机构的独立、超脱状态,学习通过法律手段运作现代国家制度,再间接通过现代国家制度来组织社会、领导社会。

3. 腐败的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腐败现象的滋生、发展和蔓延,关于腐败的危害、成因以及治理方案的研究与著述也每年以几何级数的数量增长,本文仅尝试分析腐败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出的挑战。面对势头不减的腐败现象,党对惩治腐败的态度非常坚决,相应的措施很严、力度很大,但腐败现象没有得到彻底的遏制。这个现实与我们所理解、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相悖的,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优越性的信心,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应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具体地考察腐败的原因,相当部分的政府官员腐败案件都可以归结到他们掌握或垄断了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①类似的绝对权力是他们打开欲望、恶行的闸门。在一些领导体制的不同层面上,就容易产生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要遏制、直至消灭腐败现象,这就需要从改革党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入手。

4. 宪法权威不足,司法体制需深入改革

宪法意义不同于法律,它奠定了一个国家的政体,规定了该国基本政治制度与原则,同时也规定了该国的生活方式。^②就此而言,在宪法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宪法就是最高权威,它限制政府、政党的权力,政府、政党以及其他团体和个人都应该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活动。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法律体系是维系、规范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手段,合理、健全的司法体系是贯彻法律、维持法治的依靠。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在政治实践中,宪法的权威还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遵循,任何破坏宪法权威、违背具体宪法条文的政策与做法都必须制止。同时要提高政府官员和群众的法律知识、法律素养,主要建立更健

^① 董郁玉等:《政治中国》,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②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规范了国家的生活方式,由此,宪法通过规定政体,进而规范国家的生活方式,参见《政治学》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